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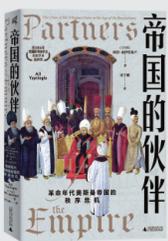
新书掠影

中国文化的根基在先秦时期。本书对先秦有代表性的七家——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的核心理念及其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进行了着重论述。



《中国文化之根：先秦七子对中国文化的奠基》
杨泽波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年6月出版

该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梳理、扎实考证林徽音先生的著作，全面梳理了林徽音对中国建筑学所作的贡献，以鲜活的史料回顾了林徽音坎坷而辉煌的一生，也打开了理解中国建筑艺术的一扇门。



《林徽音先生年谱》
曹汛 著
天津出版社
2022年7月出版

本书集中研究18世纪末19世纪初转型期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与革命，在不脱离全球史框架的同时，对西方中心论的传统叙事提出了质疑，为我们进入土耳其历史提供了一个新路径。



本书是一部献给“新散文”30年的纪念集。“新散文”代表着一种新的观念、方向、高度，是中国散文通向未来的道路，也是中国文学在经历先锋文学的青春冲动之后的一次再出发。



腓力二世不仅是西班牙历史上最著名的国王，同时也是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君主之一。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基于40年对腓力二世的档案发掘写成此书。

《腓力二世传》
[英]杰弗里·帕克 著
陆大鹏 刘晖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年8月出版

书人茶话

植物王国孕育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邹贻韬

植物，在生物学知识谱系里是与动物平行存在的一个“界”，而林奈分类法里的“界”，英文直译为“王国”，如此“霸气”的名称，似乎更适合包含植物对人类的非凡意义。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植物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性存在，二氧化碳的吸收与新鲜氧气的持续产生、能量食物的供给，还有赏心悦目的自然风光，有植物的地方便有了生机，孕育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由于多数动物的能量来源也是植物，因而可以说，人类生活在一个植物构成的世界里。当然，人类与植物世界的联系不只是机械的、生物的，更是历史的、精神的。人类以植物为动能，书写了一幕幕雄壮壮丽的历史篇章，也在与植物的互动中缔造了深刻的生态观念和自然文化。



《改变人类历史的植物》
[葡萄牙]若泽·费朗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那些改变人类大历史的“小”植物

你可曾想过，一些常见植物在短短几百年前还是让多数人颇感陌生的“稀有物”？当欧洲的绅士淑女首次目睹腰果的独特外形，惊诧得合不拢嘴；在15世纪的马尔代夫，居然会有女性因为吃香蕉而获罪。甚至连果腹充饥的马铃薯也“未能幸免”，由于味道特殊，西方人一度认为它会危害健康。

在15至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诸多欧洲国家在一些有名植物的传播过程中都曾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葡萄牙航海家在该领域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先驱者，他们极大地改变了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农业、饮食和经济结构。商务印书馆2022年出版的《改变人类历史的植物》一书作者若泽·费朗，是葡萄牙国宝级植物研究专家、葡萄牙皇家农林研究院的终身教授，他阅读了大量葡萄牙语的一手资料，收集和整理了大量极少被人提及的碎片化信息，跨越四大洲作为分类线索，展示了在亚洲、非洲、美洲起源的58种重要植物，详细描绘了这些植物的起源、迁移过程以及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

此书通过植物传播的历史，展现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书中有关原产美洲的橡胶树掀起人类出行革命的故事，尤为让人心生激荡。

1736年，法国地理学家拉孔达明在一封信里提到：厄瓜多尔埃斯梅拉达斯省有一种叫作“Hhevé”的三叶橡胶树，人们从树中能提取出一种胶质物，用来制作各种耐摔的容器和烛台。与此同时，若将这种胶质物涂在布料表面还能

起到一定的防水作用。1744年，拉孔达明在卡宴遇见了热衷植物学和园艺的工程师弗雷雷，并鼓励他继续探索埃斯梅拉达斯省的植物宝库。1747年，弗雷雷在对奥亚波基河支流的一次考察中发现了橡胶树。

1770年，英国人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发现了这种橡胶的另一种特性：它能擦干净“纸上的铅笔字及一切弄脏的痕迹”。就这样，一款大多数学童至今仍在使用文具——橡皮诞生了。1839年，查尔斯·固特异发现了天然橡胶的硫化工艺，有效地去除了其中所含导致变形的成分，并且很好地保留了材料的弹性。从此，人们得以更好地利用天然橡胶，并开发出更多的用途。1843年，固特异为这项技术申报了专利，并于翌年获批。1868年，自行车轮胎问世，橡胶由此成为了一种用途更加广泛的交通运输业“基建”材料，它在人类社会中的经济价值也变得日益重要。

巴西的橡胶出口可以追溯到1827年。1888年，爱尔兰人约翰·邓禄普发明了安装有内胎的新款轮胎。1892年，米其林兄弟发明了可拆卸的车辆轮胎。随着自行车的普及、汽车的问世，以及工业需求的日益增加，全球橡胶产业迎来了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的时期。最初的阶段，人们选择在三叶橡胶树的原产地——亚马孙河流域广泛栽种橡胶树。1880年至1890年间，贝伦和玛瑙斯两地的相关产业也取得了速度惊人的大发展。即便辉煌短暂，但那的确是一个属于“橡胶巨头们”的伟大时代。巴西希望保持对橡胶的垄断地位，所以拒

绝全部树种出口项目。然而历史最终证明：在利益驱使下这种贸易保护还是变成了一纸空文。而今虽然巴西仍在出产橡胶，但其在全球橡胶产业链中早已风光不再。

自然，绝非一个排斥人类参与的“无人区”

中国工人出版社最近引进出版了“加法叶的博物学”丛书，仅看书名——《乐园：欧洲园林之旅》《密径：莎士比亚的植物花园》《岛屿：南太平洋的植物探险》，便能从中嗅到带着全球化梦幻的泥土芬芳。在这套书中，我们得以一睹作为植物迷、思想者乃至科学家的加法叶的传奇风采。加法叶曾主持编修过多个版本的巨著《澳大利亚植物学》，当中系统、权威的植物调查资料在其身后很长时间里都持续泽被后世。与先前及同代占多数的“经院”植物学家不同，加法叶极度推崇面向生活的人文主义植物学。

加法叶曾经跟随父亲在他们位于悉尼的异国苗圃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园艺经验，同时凭借过人的审美和艺术天赋，用35年的时间将墨尔本植物园并井有条却平淡无奇的种植形式，转变为令人疏密有致的成名手艺，使墨尔本植物园变成了全世界最壮丽的植物园之一。

加法叶畅游欧洲各地名园后，写下了传世之作《乐园：欧洲园林之旅》。在《乐园》里，见多识广的加法叶没有迷醉于金碧辉煌的豪华建筑，而是百般推崇“野生园”理念：“‘野生园’注重形式

的园林、公园或游乐园相对，因为后者均是按照线条和规则布局。”“野生园”的要领是把控人类介入与自然本真之间的微妙平衡：“一方面，避免将自然置于线条和规则之下，全然不顾生硬和迂腐，将花朵和植物排列得像是普鲁士的军队；另一方面，借助艺术和品味的帮助，防止凌乱恣肆的生长。”可见对心归山水的返璞者而言，自然绝非一个排斥人类参与的“无人区”，他们所渴望的，是一片稍经修饰而未被篡改、能以本来面目顺畅发人类官能享受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之地。

加法叶在《乐园》中向读者展示了一座他颇为赞许的“野生园”——爱丁堡的皇家植物园和树木园：“这座园林的布局和管理令人仰慕，它不仅是一座科学宝库，更拥有美丽的小草坪、各类景观和植物。灌丛中的小径曲折而蜿蜒，树木十分有趣。”让人特别震撼的是，由这座园林的特定视线外望，繁华辉煌的城市景观尽收眼底，人工风貌与自然景致毫无违和，实现了一种兼备风光与哲学意义的“借景”：“在印佛里展览中心前方的树木园内，一对俯仰爱丁堡的壮丽风光，从那里可以看到一幅现代雅典的完整景象。”

说城市一定是反自然的？在对看的深情凝视中，城市与郊野携手构筑了人类重生生存世界的一个冷静场域。

草木文化寄托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感悟

山村农夫终日面山拥水，自然风光

对他们来说谈不上珍稀，因此千百年来，向往自然者多数还是心为形役的书生墨客。这便牵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书斋里的白纸页，能唤起读书人的乡野之梦吗？加法叶在他的另一部名著《密径：莎士比亚的植物花园》里给出了答案。

“有许多证据证明，莎士比亚，这位英语世界中伟大的诗人，几乎无所不知。其中有趣的是他对各类植物花卉的熟悉，他也许称不上一位富有科学性的植物学家，而更像是千姿百态的大自然中一位细心的观察者和热爱者。”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精神氛围中，加法叶自然而然地将注意力投向了莎士比亚戏剧和诗歌中的植物、水果和花卉。加法叶对莎翁的文字怀有独特的“同行敬意”：“莎士比亚将天地万物引入他的作品之中，这是这位伟大诗人的众多独特魅力之一，令他受到上至贤哲下至凡夫的欢迎。”

为了探掘莎翁的“自然之作”，加法叶必定反反复复精研过莎翁传世篇章，否则他何以知晓“莎士比亚35次写到橡树或者它的果实橡子”这般细致到无以复加的数据？通过文本细读，加法叶把莎翁名著中的植物挑拣出来，串起一部文化底蕴深厚的植物与生态文明小传：《暴风雨》里的松树、《麦克白》中的报春花、《皆大欢喜》中的黑麦，都在加法叶的细腻解读里厘清了来龙去脉。有鉴于此，与其说《密径》是一部摘自莎士比亚作品的植物图谱，不如称它为跳脱文本、拥抱自然的一场精神洗礼。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草木被广泛融入到大各种形式的文化创作中，寄托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感悟。在中国，《诗经》到《红楼梦》，草木的身影缕缕不绝，丰富的草木文化一脉相承。将人和草木相类比，各个民族概莫能外，尤其在中国古典文化中，许多植物已经形成了特有的文化象征意义，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比如松竹梅是岁寒三友，梅兰竹菊是四君子等，这些植物的个性气质已经为国人所共识。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几回清梦到花前：红楼女子的草木情缘》将《红楼梦》中的43位女性角色与百草花木逐个对应。草木之所以有情，是因为观者心有“岩中花树”。红楼女子的草木情缘，也是因为人如秀草嘉木，枯荣有定数却清芳不远去。由此观之，《几回清梦到花前》与《密径：莎士比亚的植物花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时空中的旅者，在草木间寻得了栖居归宿。

文化寻踪

永不消逝的热情

朱洁蓉

我在西班牙南部的城市，也就是蝙蝠田善卫停留了十个月的格拉纳达生活学习了六年，在疫情爆发之初离开。对整个国家的印象是直接的、新鲜的、循序渐进的，却依然发现很多问题是悬而未明的。看了蝙蝠田善卫《西班牙断章》(1979)和《热情的去向》(1982)两本相关的文化随笔，隔着40年的时间长河，作者带我加深了一些已有的认识和了解，补足了一些遗漏和缺失，展示了不同视角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也激发了我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不同评价的思考。

西班牙的国土面积和我们四川省大抵相当，但东西南北中不同区域，因着不同的历史和地理状况，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蝙蝠田善卫循着地理区域划分来展开他的西班牙书写的。《西班牙断章》是他刚到西班牙头两年，按迁移轨迹写下的从西北到南部的几个地区的文字。从最初的落脚点阿斯图里亚斯的小山村印象式的描写开始，恰好也暗合了阿斯图里亚斯王国作为天主教徒在此建立的第一个王国的初始意义，讨论了山对于西班牙这个国家的性格及文化文明的决定性意义，随后一路南下，途经莱昂地区、卡斯蒂利亚地区、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终止于半岛的南端安达卢西亚。在每个地区，作者都会把罗马时代、西哥特人时代、伊斯兰时代、收复失地运动、西班牙统一后在神圣罗马帝国等各个时期的痕迹一一梳理，就如标题所示，把西班牙的历史和地理如截断的篇章呈现给读者。

蝙蝠田在每个地区停留了长短不一的几个月。这部分的文字略有浅尝辄止的感觉，很多地方还期待再深入的时候，作者却突然停笔了。大约是践行了如此感悟：“即使不明所以，即使难以理解，也完全不要紧。让那种不可名状的感动和经验在自己的身体里一点点地累积，仅此便足够了。”

但这样的遗憾，到三年后的《热情的去向》被时间的沉淀自然解决了。蝙蝠田定居在巴塞罗那，重点写了他居住地四周的西班牙东北地区：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巴斯克、安道尔地区以及海岛马略卡。表面看是延续了前一本的地理移动的写法，但仔细读来，转换到以地区为背景的单主题的讨论。关于圣地亚哥朝圣之路，蝙蝠田的重点还是对中古世纪基于宗教信仰的朝圣者的描写，他在自己的七十八年，全球旅游还没有像新世纪这么如火如荼，今天的朝圣之路更多是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徒步的一种选择。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话题，从蝙蝠田所在的年代到今天，在西班牙国内经历了几番沉浮，从遗忘到回忆到重建记忆，内战几乎重塑了民主时期的西班牙。难能可贵的是，蝙蝠田直接记录了亲历内战和佛朗哥统治的普通西班牙人的叙述，通过这部分的书写，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于书写战争的审慎态度，尤其是涉及一个国家的两个阵营的左右问题，他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亲疏，更多是客观陈述。

蝙蝠田是个学识渊博的作家，他把西班牙当作一个丰富的整体，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和思考。不知是否因为日本人一贯的内敛和恭敬，即使旅居十年他也没有融入西班牙火一般炙热的生活中，而总是远远地保持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大概这是书写宏大历史通常会给人的印象，因为较少墨于构成这深厚整体的单个西班牙人，让他的文字少了些许的温度。但这些丝毫不会影响到他带领读者一次次穿越历史的迷雾回到过去，认识这个国家绵长永恒的那些属性，从而走近今天的西班牙。



《热情的去向：西班牙断章》
[日]蝙蝠田善卫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三味书屋



《忧患：边事、党争和北宋政治》
林鹤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论及宋辽关系，现在学界愈发倾向认为是“国”与“国”的交往，而不再遵循传统的夷夏之别观念。今人研究，早已超越古人的认知框架，从多角度解释这段复杂的历史关系。既有李玉在前，后学者如何有新意、有依据，拓展这一领域，实属难题。

林鹤博士新作《忧患：边事、党争和北宋政治》令人耳目一新。此书对宋、辽、西夏三角关系的重要节点进行了细致分析，并将事态发展与皇帝个性、君臣关系、政治风气等互为联结，从而将国家外交话题有效延展至对政治本身的思考，拓展了论述的边界。

作者善于合理勾连不同史实，敢于做出不同于以往的推论。比如宋与西夏的斗争形势，作者认为是宋辽两国君王“昏招”频出的产物。本书的前两章，着重讨论澶渊之盟和庆历增币。作者指

多角度探寻宋、辽、西夏复杂的历史关系

赵慕宇

出，以澶渊之盟签订前的形势，主动权在宋不在辽。辽国虽大兵长驱直入，但后勤保障难，有进退维谷的风险；反观宋朝，可战亦可和，实际上，辽国在合约签订后，也生怕宋军围堵追索。

再看澶渊之盟的内容，也可以印证这是一个“屈而不辱”的结果。盟约规定宋辽皇帝兄弟相称，遵循平等礼仪交往，宋朝每年付辽20万匹绢、10万两白银——作为契丹放弃燕云十六州部分领土的补偿。

纵然较之汉唐“虽远必诛”的威风，宋朝的以币求和，让人略感气馁，但就实际效果而言，以全国财政收入不超过5%的收入（算法有不同说法，姑取最大值），换取两国和平，远比战争的巨大耗费来得划算。陶晋生教授在他的《宋代外交史》中，也曾正向肯定这一政策。

实际上，北宋朝野也普遍认为，澶渊之盟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的混乱，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史实功绩。因此，真宗在泰山封祀，并不是粉饰太平、虚张声势，在他自己看来，应当是为河北百姓带来和平，给大宋带来安宁。

真正打破宋辽平衡关系的是西夏，作者认为“庆历增币”这一事件的意义被低估。西夏由党项人建立，自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逐渐强大，自1040至1044

年，宋夏和议，辽国的插手与调停，演绎出新的三角关系。

宋朝方面，以吕夷简“以夷制夷”为主要思路，企图凭借与辽国的关系，让辽国出面说服李元昊臣服，同时作为酬劳，宋朝将岁币从30万提高至50万，改文书中“助”字为“纳”。

宋朝的示弱，令人费解。本是一记“昏招”的“以夷制夷”，很有可能给宋朝带来更大的麻烦，谁能想到，辽兴宗竟主动与西夏交兵，并大败而归。兴宗缘何如此？林鹤认为：“辽夏双方所以不能妥善解决边境争端，情况不断恶化，终究兵戎相见，正是因为宋夏和议问题使原本结盟的双方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最终被部族问题引爆。”

其实，兴宗完全可以阳奉阴违，但自大的心理，让他企图在宋朝面前树立权威——他想让李元昊低头，辽朝若能顺利平复此事，便可在辽宋关系中处于高位。从契丹使者多次来访打探，也可窥见此意。但是，当李元昊不肯就范，兴宗便不惜冒险维护自身的地位，没想到却弄巧成拙。

在一番争斗之后，宋、辽、夏谁也没有占据上风，格局又大体回归。然而，一如往昔的态势，实则粉碎了宋朝的“太平幻象”，既有了不想打的心魔作祟，也有打

不过的心理阴影，宋神宗“富国强兵”的宏愿，也不免与此番刺激有关。

再如王安石的第二次罢相，作者认为，缘于其与神宗在对辽问题上的分歧。宋神宗和王安石，是一对历史上互相信任到难以置信的君臣。王氏二度拜相后，针对宋辽边界纠纷，神宗意欲割地求和，在作者看来，这一行为最终导致王氏二度罢相并不再复出；同时也透露出神宗隐秘的恐辽心态。

神宗对于西夏和辽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对西夏是毅然决然，甚至狂飙突进地剿灭；对辽国则是患得患失、极度自卑的忍让。

神宗曾取得熙河之役的胜利，这次战争的敌人是唃廝囉，控制其政权，有利于夹击西夏。按照主将王韶《平戎策》构想，最终要占领“河湟”，对西夏形成钳制。没想到取得熙河地区后，包括神宗在内的政府班子受到鼓舞，过分乐观，随后便调集40万大军，企图一举消灭西夏，这次大决战以失败告终，而这次灵州惨败后，神宗仍不气馁，随后又有永乐之役的失败。“欲速则不达”，作者认为，针对西夏这类经济基础薄弱的政权，在哲宗朝所采用的遮断、浅攻更为实用。

相反，面对辽国的神宗，却像是换了一个人。1072年，宋辽在界河发生边境

摩擦。王安石在排除辽国有意侵犯宋朝的可能性上，主张主动退让，遣散边境巡逻队，以免再生是非。王安石对辽“辽之大方针下，并非一味忍让，而是在不必要引起纷争的点上，适当让步，避免盲动。

但是，王安石显然低估了辽国野心，事态不仅没有平息，而且辽国还要求河东地区的领土。作者认为，这件事的应对失策，“王安石要承担主要责任。他过于自信，低估对手，认为辽道宗平庸无能，没有见识和判断力，胸无大志，这是造成误判的主要原因”。

神宗执意要与辽国开战，惧怕契丹的心理，作者有所指出和分析，然而也有意犹未尽之感。除了将这种态度归结为之前的对夏战争失利，或与王氏扭曲的压抑关系之外，也许仍有其他要素值得探究。

作者有意识地对史学本质进行思考，并付诸于自身的历史写作，值得肯定。如其所言：“没有超越个人的历史必然性，有的只是特定人物在特定历史时刻，对特定问题作出的特定回应，以及相应产生的特定历史后果。”抛弃普遍性、因果律，而游走于历史的可能性，也许离真相更近，也更能作出有意义的阐释。